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

张根福

【提要】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总数约有 500 万人,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其中 200 余万人迁至省外,主要分布于闽、赣、皖、沪和华中、西南各省。大部分移民是在省内迁移。战时浙省移民迁移持续时间较短,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由于种种原因,战争期间即有部分移民回迁。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移民均回迁原住地。难民迁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

【关键词】 抗战 浙江 人口迁移 地域分布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为避战祸被迫进行迁移。对中华民族这场空前的大迁移,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区域(省区)人口迁移的研究更是如此。为此,本文探讨战时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希望能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迁移,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它虽有部分自觉的、有组织的群体迁移,但更多的则是自发的、非组织的个体行为,表现为非秩序的社会运动,它与常态下的人口迁移有着重大区别。常态下人口迁移的主体是可以明确选择的,迁移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可以肯定的,战时人口迁移在战局演变下则具有不确定性。为此,笔者在研究时,将本文的人口迁移界定为:越过一定地界、经历一定时间的人口移动。这里的“一定地界”,包括渐省与他省之间,也包括省内各区域之间,如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及同一行政区的县城与乡村、平原与山区之间等。“一定时间”既包括永久性,也包括暂时性,但这里的暂时性是特指的,如战役的前后或重大事件的前后等。

为论述和分析问题的方便起见,本文将浙江省划分为杭属、嘉属、湖属、宁属、绍属、台属、金属、衢属、严属、温属、处属等 11 个区域。

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过程

浙江战时“寇祸连年”,多数市县先后沦于敌手,“未遭沦陷者亦皆迭经窜扰”,其能免于寇患者,“仅龙泉、云和、庆元、景宁、泰顺、淳安、遂安、磐安等数县而已”。残酷的战争使浙江省遭受严重的破坏,据《浙江省善后救济资料调查报告》,农业方面,8 年中全省共计荒芜耕地 280 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10%;工业方面,损失工业 293 家,手工业 745 家,其他如碾米、酿造、面粉等业 10 862 家,共计 39 240 805 000 元。其他各业损失也不在少数,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即达 33 434 024 000 元。大批民众由此失去生活的基本依恃和谋生的基本途径。同时浙江大批房屋被毁,“虏氛所届,闾里为墟”,8 年间计毁屋“全省以 75 市县计算(因遂安、庆元二县无毁损),约在 731 400 间”。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和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为避战祸,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觅栖身之处。加之战时浙江的自然灾害也极其频繁,且常常是水旱风虫诸灾并发,致使大批灾民“或避难他乡,或迁移内地”。

关于战时浙省人口迁移的数量,浙省政府在战时曾进行过调查,估计难民总数在 500 万以上。抗战胜利后,沦陷区解放,各地迁移民众相率还乡。至 1945 年冬,据 72 市县上报材料统计,尚有难民 1 574 200 人。战后,国民政府对战区各省市的难民及流离人口数也进行过统计,其中浙江的难民及流离人口达 5 185 210 人,仅次于江苏、湖北、湖南、河北、山东、河南等省。

从上述的调查统计中可以得知,战时浙省人口迁移的总数在 500 万左右。调查资料没有具体区分迁向省外的人数和省内迁移

的人数,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口迁向省外呢?因浙江人口迁移情况极其复杂,各地沦陷前后不一,不少民众战役一结束,便开始回籍,抗战胜利后,更有大批人口迁回,加之缺乏完整可靠的统计材料,因此要弄清其迁出总数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对其最低值进行估计,但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约数。其估算方法是:

$P_2 - P_1 = B - D + I - E$ (P_2 为战后人口数, P_1 为战前人口数, B 为战时出生数, D 为战时死亡数, I 为战时迁入数, E 为战时迁出数)。

那么, $E = P_1 - P_2 + B - D + I$ 。

P_1 以 1936 年为标准,此年内政部为筹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需要全国各行政区人口数字,通令各省市政府,查报所属各县最近户口实数。浙省的上报数为 21 230 749 人,其来源大部分系根据编查保甲户口所得,大体反映了抗战前的人口数。 P_2 以 1946 年为标准。这一年度,为准备实施新户籍法,重奠战后户政基础,曾于 4 月 1 日举行了一次全省户口调查,获得了全省总人口比较准确的数据,即 19 657 551 人。 I 据《浙江省善后救济资料调查报告》,至 1945 年冬上报之 72 县,尚有 56 289 人,每县平均数为 782 人,该资料缺绍兴、新昌、衢县、鄞县、武义统计数,以每县平均数计算,5 县为 3 910 人,则总数为 60 199 人。浙省缺乏战时出生数统计,战时死亡数只有战争死亡人数统计(为 317 268 人),而无非战争死亡人数统计。但我们可参照抗战前的自然增长率进行估算。入民国以来浙江省人口的增长是缓慢的,以 1928 年的总人口数(20 642 701 人)与 1936 年人口数相比,8 年间增加 588 048 人,年平均增长率仅 3.5%。若以抗战前 8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标准,在正常情况下,1937—1945 年的人口增加数(即 $B - D$)应为:

$21\,230\,749 \times [(1 + 3.5\%)^9 - 1] = 678\,208$ 人。

再减去战争死亡人数 317 268 人,战时实际增加数为 360 940 人。这样,迁向省外人数大约是:

$21\,230\,749 - 19\,657\,551 + 360\,940 + 60\,199 = 1\,994\,337$ 人。

可见,迁向省外人数近 200 万。

浙省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杭嘉湖沦陷时期、宁绍战役时期和浙赣战役时期。

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江浙沪局势日趋紧张。11 月 5 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战火烧到浙江。不久,日军相继占领嘉善、嘉兴、海盐、平湖、桐乡、吴兴、长兴、武康、德清、海宁、余杭、崇德、杭县、富阳及杭州的一些主要市镇,对其他区域也进行狂轰滥炸。杭嘉湖地区“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许多地方“朝为繁华街,夕暮成死市”。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只得抛弃家园,扶老携幼,仓皇逃难。省府机关、社会团体、部分学校及工厂商店等陆续南迁。战前,杭州市有 50 多万人,沦陷时仅剩 10 万。其他各县迁移人数也很多。伪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曾于 1938 年 11 月底至 1939 年 3 月,对杭嘉湖部分陷区进行过调查。杭县塘栖、瓶调、临乔、钦履、上四五区战前共有 309 624 人,调查时降至 220 228 人,减少 28.87%;海宁一、二、四、五四区,由 210 000 人降至 135 000 人,减少 35.71%;平湖城区及永丰、当湖、启元、东湖四镇,由 23 506 人降至 12 358 人,减少 47.43%;德清,县属各处由 176 963 人,降至 139 800 人,减少 21%;嘉兴城区减少 82.95%;嘉善一、二、三、四四区,减少 15.04%;崇德减少 21.19%。王惟英也曾根据一些资料对抗战初期的浙省难民进行了统计,迁入后方国统区有 1 310 801 人。其来源有三:一是杭嘉湖各旧府属人民,受战争影响,仓猝离乡;二是后方各县在京沪及杭嘉湖一带,经营农工商业者,如宁绍之商人,东阳之土木工人,温处之农户,骤告失业,迁避回籍;三是松沪难民,迭次后移,流落浙境。其中战区各属民众数量最多。杭嘉湖地区人口迁移情况从战前、战后的人口比较中也可清楚地看到(表 1):

(作者张根福,1964 年生,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政法系 321004)

战前杭嘉湖地区共有人口 4 829 379 人,至 1946 年降为 4 099 018 人,减少 730 361 人。其中杭属减少 431 279,嘉属减少 57 742 人,湖属减少 241 340 人。除部分战时死亡外,大多属迁移人口,它不包括各属县境之内的迁移。

表 1

市县	1936 年	1946 年	增减数	市县	1936 年	1946 年	增减数
杭州市	574 439	367 802	— 206 637	海 盐	206 292	185 879	— 20 413
杭 县	402 643	335 440	— 67 203	崇 德	198 264	183 615	— 14 649
海 宁	367 050	306 261	— 60 789	平 湖	278 823	253 872	— 24 951
富 阳	216 893	168 027	— 48 866	桐 乡	161 805	145 362	— 16 443
余 杭	137 577	114 590	— 22 987	吴 兴	702 118	548 517	— 153 601
临 安	89 751	80 797	— 8 954	长 兴	243 067	225 190	— 17 877
于 潜	68 547	59 609	— 8 938	德 清	177 552	142 542	— 35 010
新 登	63 483	63 069	— 414	武 康	61 970	50 102	— 11 868
昌 化	78 367	71 876	— 6 491	安 吉	88 648	75 627	— 13 021
嘉 兴	423 974	425 557	+ 1 583	孝 丰	93 419	83 456	— 9 963
嘉 善	194 697	211 828	+ 17 131	合 计	4 829 379	4 099 018	— 730 361

资料来源: 1936 年人口数据内政部统计处编印《户口统计》, 1938 年 5 月; 1946 年人口数据《浙江省民国卅五年户口统计》, 浙江省图书馆藏。

杭嘉湖地区沦陷后,日军暂时固守钱塘江以北,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钱塘江以南局势一度相对安定。其间虽有部分日军渡江骚扰萧山、诸暨、绍兴等地,但对整个时局影响不大。这种对峙局面一直到 1941 年宁绍战役爆发才被打破。同年 4 月,日军大举进犯浙东,绍兴、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上虞等地先后沦陷,宁绍其他各县也遭侵扰。受战事影响,人口迁移极其频繁。如宁属之鄞县,自县境沦陷,“兵灾之余,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城区民众,“备受敌伪之蹂躏摧残,以致迁移靡定或因此而流离失所。”许多乡镇也逃亡严重,如林锡乡,“迭遭兵灾匪祸,十室九空,满目疮痍,殊深悯恻。”第九乡镇,“居民见敌临境,皆惊惶疏散,逃避一空。”章乡原有人口 15 740 人,战时被害及逃亡人数占 20%;宝幢镇原有人口 6 209 人,被害及逃亡者占 20%;江东镇原有人口 40 000 人,被害及逃亡者占 30%;俞塘乡原有人口 2 878 人,被害及逃亡者占 14%。其他如和益乡、桃浦乡、丰南乡、龙嘘乡、永南乡、瞻岐镇等人口逃亡也不少。据有关统计,鄞县共“有灾民难民约数 20 余万人”。又如镇海,自日军登陆后,“商店业主和居民纷纷逃难,县城人口从五万降到六七千”。宁绍其他各县人口也纷纷迁移。以战役前的人口数与 1946 年人口数相比,宁属各县共减少 493 885 人,绍属各县减少 482 475 人(见表 2)。

表 2

县别	战役前	1946 年	减少人数	县别	战役前	1946 年	减少人数
鄞县	787 247	588 340	198 907	绍兴	1 189 374	825 933	363 441
镇海	377 666	313 632	64 034	萧山	521 234	505 561	15 673
慈溪	299 447	259 374	40 073	诸暨	534 455	500 005	34 450
奉化	296 477	236 328	60 149	余姚	707 242	688 914	18 328
象山	217 656	207 952	9 704	上虞	337 834	305 663	32 171
定海	414 130	293 112	121 018	嵊县	425 535	407 748	17 787
				新昌	255 975	255 350	625
合计	2 392 623	1 898 738	493 885	合计	3 971 649	3 489 174	482 475

资料来源：战役前人口数见《历年（28—32 年）户口增减情形》，浙江省档案馆：29/2/24；1946 年人口数据《浙江省民国卅五年户口统计》，浙江省图书馆藏。

除战时死亡外，其余都是迁移的结果。此数包括一批抗战初期迁至宁绍各属的杭嘉湖民众及其他省区的迁浙人口在战事发生后的再度迁移人数，但不包括县境之内的迁移人数。

1942 年 5 月，日军为了封锁浙闽沿海地区和浙赣路，破坏衢县、丽水、玉山等机场，以消除其对日本本土的威胁，发动了浙赣战役。这次战役历时 3 个多月，浙省 30 个县的县城沦于或一度沦于敌手，6 个县的县境曾遭日军窜扰，战区人口迁移络绎不绝。据吴之英《旅行金华战区记事》记载，从诸暨到义乌，“沿途绝少发现人民踪迹”；从义乌至金华，民众大量逃亡，如苏溪镇“仅存少数之龙钟老妇而已”，义亭镇“所留人民，不过百一而已，民房亦十室九空”；金华城厢，“原有商民七万余人，另有流动商民三万余人”，战后已成一座空城，“经派人四处巡查，得能在茅棚草舍，与夫其他偏僻处所发见者，仅老弱妇孺十八人而已。”原迁永康的省府机关、社会团体、金融机构及部分工厂商店等也转迁处属地区，永康因战事“无家可归，流浪各地难民计 12 000 人。”战区其他各县人口逃亡也极其严重，现将受战事影响的 36 县战役前的人口数与 1946 年人口数进行比较（见表 3）。

表 3

县名	战役前	1946 年	增减数	县名	战役前	1946 年	增减数
金华	318 941	236 306	— 82 635	淳安	264 649	189 664	— 74 985
兰溪	308 136	280 090	— 28 046	分水	48 520	42 171	— 6 349
东阳	460 851	449 826	— 11 025	象山	217 723	207 952	— 9 771
义乌	326 454	327 098	+ 644	嵊县	407 748	407 748	0
永康	284 794	271 873	— 12 921	新昌	250 985	255 350	+ 4 365
武义	105 743	93 155	— 12 588	诸暨	502 300	500 005	— 2 295
浦江	233 762	232 728	— 1 034	天台	257 721	254 579	— 3 142
汤溪	139 559	111 477	— 28 082	丽水	146 957	115 024	— 31 933
磐安	81 042	81 107	+ 65	遂昌	138 559	116 069	— 22 490
衢县	363 465	318 386	— 45 079	松阳	134 698	116 710	— 17 988
龙游	204 134	170 593	— 33 541	缙云	200 345	203 201	+ 2 856
江山	321 326	270 960	— 50 366	宣平	77 594	73 930	— 3 664
常山	156 195	134 656	— 21 539	青田	273 107	256 496	— 16 611
开化	151 583	119 775	— 31 808	永嘉	748 639	769 569	+ 20 930
临安	93 691	80 797	— 12 894	瑞安	550 884	538 757	— 12 127
新登	70 336	63 069	— 7 267	乐清	372 254	379 189	+ 6 935
桐庐	115 706	105 644	— 10 062	平阳	742 119	709 445	— 32 674
寿昌	84 088	77 485	— 6 603				
建德	132 560	122 699	— 9 861	合计	9 287 168	8 683 583	— 603 585

资料来源：战役前人口数见《历年（28—32 年）户口增减情形》，浙江省档案馆，29/2/24；1946 年人口数据《浙江省民国卅五年户口统计》，浙江省图书馆藏。

36 县共减少 603 585 人，其中灾情较重的金衢减少 175 622 人，衢属减少 182 333 人。此数除少量战时死亡人数外，也基本上为迁移人数，它包括杭嘉湖沦陷时期和宁绍战役时期退至这些地区之部分人口再度迁移的人数，但同样不包括县境之内的迁移数。

至抗战后期，浙省战事相对比较平静，人口迁移也开始大幅度减少。1943 年 5 月至 12 月，浙省政府对孝丰、遂安、寿昌、江山、常山、温岭、瑞安、遂昌、景宁、云和、宣平等 11 县的人口进行了统计。8 个月中共迁移人口 52 527 人，其中迁入 31 940 人，迁出 20 587 人。

1944 年，为配合豫湘桂战役，日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浙赣战役，受战事影响的龙（游）衢（县）地区及丽水、温州等地的民众也进行了迁移。因这次战役属局部的牵制性作战，规模不大，迁移人口比前几次要少得多。但抗战后期，浙江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灾区民众受其影响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迁移。

人口回迁问题

人口回迁包括战时和战后两个时期。

抗战初期,在沦陷区就已有人口回迁现象。杭州市,沦陷时仅剩 10 万余人,但自 1938 年初开始,便陆续有人回杭。1938 年 7—12 月,来杭之难民有 30 959 人,其中不少就是原先从杭州迁出的。此后,随着工商和交通各业的逐步恢复,“人民来归日众”,1939 年,“每日来归者尚不下二三千人”。1940 年回迁人口增加更快,该年杭市人口“已增至三十二万”。杭嘉湖其他各县回迁的人数也很多。伪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曾于 1938 年末至 1939 年初对嘉善、吴兴、长兴、平湖、武康、桐乡、海宁等县的部分区域进行过实况调查,其中也涉及一些地方迁回人数。现根据调查资料,整理如表 4:

表 4 战时嘉善、吴兴等 8 县部分地区迁回居住人数统计 (1938 年末至 1939 年初)

县别	调查区域	灾前人数	迁回人数	百分比 (%)	县别	调查区域	灾前人数	迁回人数	百分比 (%)
嘉善	第一区	54 515	40 886	75	吴兴	松亭镇	12 300	9 600	78
	第二区	46 727	36 992	79. 2		织里镇	23 725	11 897	50. 1
	第三区	50 621	45 556	90		新蜀乡镇	3 120	2 996	96
	第四区	42 833	41 976	98		松亭乡、护浪乡	6 850	6 147	89. 7
桐乡	城区城北乡镇	6 000	5 100	85		石淙乡镇	42 810	411	1
	城区城坊乡镇	5 837	5 774	98. 9		大河乡镇	10 360	3 962	38. 2
	城区附廓乡镇	5 050	5 150	102		升山乡、民熟乡	11 041	9 002	81. 5
	城区城乐乡	6 500	5 525	85		大钱镇	4 592	1 716	37. 4
海宁	第一区盐官镇	12 600	1 236	9. 8	武康	白雀乡、滨湖乡	6 029	5 587	92. 7
	第二区硖石镇	100 000	14 000	14		余英镇	3 000	67	2. 2
平湖		247 996	173 597	70		上柏镇	3 800	87	2. 3
长兴		247 000	178 000	72					

资料来源: (1) 据《浙江省政府成立初周年纪念特刊》所载嘉善、吴兴、长兴、平湖、武康、桐乡、海宁等县灾况调查表整理计算; (2) 武康上柏镇灾前人数统计为 760 余户, 以每户 5 人计, 共 3 800 人; (3) 表中百分比为迁回人数占灾前人数的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到,各地回迁人口是不同的,嘉善、长兴、桐乡、平湖的比例较高,在 70%以上,个别区和乡镇甚至在 90%以上;吴兴各乡镇情况悬殊,高者如新蜀乡镇达 96%,低者如石淙乡镇仅 1%;武康、海宁各乡镇比例较低,武康仅 2%,海宁也不到 15%。

抗战中后期,人口回迁仍络绎不绝。如杭州市随着市场日臻繁荣,“工商各业蓬勃,逗留客地市民纷归故里,以致本市人口愈形激增。省会警察局据各分局队报告,上月份(1942 年 7 月)共有 39 万 2 千 6 百 71 人。”伪警务处于 1943 年对抗嘉湖及萧绍等 17 市县其控制区人口进行统计,“计自三十年九月份起,至三十二年六月份止,人口总数已由 1 544 975 人增至 2 331 100 人。”在浙东宁属陷区,同样存在人口回流现象。据鄞县政府鄞东区署户口异动月报统计表,1943 年 4 月至 1945 年 7 月(缺 1945 年 1 月),该区共迁入人口 26 732 人,其中男 15 106 人,女 11 626 人。另据鄞西区署户口异动报告表,1943 年 7 月至 1944 年 5 月,该区迁入 3 363 人,其中男 1 733 人,女 1 630 人。金衢等其他陷区也是如此。如 1943 年 10 月 18 日的《浙江日报》刊登了《省警务处计划办理金华等县居住证》的消息,谈及伪警务处“以浙东和平地区日渐拓展,金华、兰溪、义乌、东阳、诸暨、浦江等县均已恢复县治,人民纷纷归里安居乐业,为确保人民身份,计划办理居住证”。由此可见,战时人口回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

回迁数量相当可观。

战时之所以会有大规模人口回迁,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迁移民众生活窘迫,无以为生;对家乡存在“恋土情结”及对财产的担忧;对迁入地生产、生活的不适应以及日伪的招致引诱等。其中生活窘迫,无以为生及日伪的招致引诱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战时迁移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全生命并使生活有所保证,但这最低要求无法满足时,只好重返故里,以求生路。战时的民众迁移,均系仓猝离乡,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惨苦。那些迁避战区附近山乡僻壤者,或因无资远离,或以为战事不久,即可还乡,而不愿远去。日复一日,资尽粮绝,生计日蹙。“据报现以糠秕草类充饥者,所在皆是,为状之惨,不忍观闻”。此类情况,仅战初避居钱江南岸及富阳山地一带,“已有三万余人,在沦陷区内,避寇入山,其生活之类于此者,尚不计在内。”那些薄有积蓄自动迁居于后方各县者,“历时既久,资斧已罄,典质将尽,告贷无门,日常生计,渐濒绝境,此项难民颇占多数,严重情势,将与日俱增。”甚至一些避居上海租界的绅商也面临困境,“即如杭城附近各处绅商之在沪居住者,不但中下级资产之住户,于兹五、六月来,已有捉襟见肘之处,即比较稍富有者,亦有难于为继之慨。”可见,迁移群众生活是十分困苦的,除少数地主富商外,广大民众生活窘迫,无以为生,加之衣食失调,寒暑靡当,疫病丛生,处境十分悲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虽采取过不少收容、救济、安置的措施,但受救济、安置人数毕竟有限,一些收容所因受人力、财力的限制,常常不堪负担,难以为继。因最起码的生存、生活环境得不到保证,避难民众只能重新卷起行李,返回故地。

日伪的招致引诱也是人口回迁的重要原因。日军占领沦陷区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在沦陷区也实施了一些维持地方秩序,恢复生产的措施。如,在工业方面,它一方面迫令原有的工业复业,另一方面奖励小型家庭工厂的开办,同时,“为使诱致资本的效果增大起见,发还军管工厂的办法,予以部分的实现,以减除资本家工厂被没收的忧虑。”在商业方面,督促各业商店复业,并在一定期限内“缓征旅店、住屋、店屋等捐以纾民力”。日伪以此引诱工商界人士回迁为其服务。日伪还在“中日亲善”的旗下,采取了一些怀柔招致的措施,如平糶、施粥、制发寒衣、小本借贷、收容难民、散粮赈济等,“其目的则在引诱我民众回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杭嘉湖陷区,“地方秩序,逐渐恢复,向日流亡于上海、宁绍等地人民,亦相率归来。”又如浙赣战役时期,日军占领金华城区时,该城已是一座空城。但日伪通过建立民事指导处、民事调解处等机构开展工作,在城区设置临时公共住所,“着重给回家住民以各种便利”,并广泛开展宣传,“以增大其胆识而促成与实现其回家的决心”,诱使相当一部分人回迁。回家登记领证处“开始实行之期未至,而人民之鹄候于途者,几已满坑满谷”,至1942年7月中旬,“逃住在山乡间或山上的数万住民,都已陆续得能仍回其故居”。浙赣路沿线其他各地日军也采用类似手段诱使民众相继回迁。

总之,战时人口回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生存条件的艰难和日伪的招致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些回迁的民众并不是心甘情愿受日伪统治,而是为了生存。其中虽有极少部分人沦为汉奸,做日伪的鹰犬,但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做出对不起国家、民族之事。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抗战胜利后,随着沦陷区解放,人口开始大规模回迁。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报社、学校、工厂、商店等大都迁返原地,大批难民也纷纷回到原籍。据《浙江省善后救济资料调查报告》,1945年冬上报材料的72市县内本省外县难民仅20余万人。可见,大部分难民已经迁回。对流落省外的人口,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江分署专门成立了遣送机构,从事遣返工作,但因受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得到遣返的毕竟是少数,大多难民自行迁回。1946年浙省人口数为19 657 551人,1947年为19 942 112人。1949年则增至20 831 000人,与战前的21 230 749人相比,仅差399 749人。除战后生育率有所增加外,大批人口迁回是主要的原因。

迁移人口的地域分布

(一)迁向省外人口的分布

迁向省外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闽、赣、皖、上海租界和西南各省。

1. 闽、赣、皖

抗战时期,闽赣两省及皖南地区局势相对平静。1938年5月,福建省府机关迁往闽北小城永安,军事机关迁至南平。1939年2月,南昌陷落,江西省政府也陆续迁至赣南的泰和、吉安、赣州等地。闽北、赣南成为福建、江西的后方抗战基地。从抗战初期开始,浙省战区的民众便大批迁入闽、赣、皖诸省。抗战中、后期,特别是浙赣战役时期迁入这些省份的浙籍人口则更多。诚如当时的浙省主席黄绍所说,“三十一年之寇灾,逼得浙省好多的人到外省去度流浪生活,尤其是福建、江西,为浙江灾民流浪的两个目的地。”

迁入福建的浙省人口主要分布于闽北地区。譬如南平,战初市区的居民,从1万人猛增到10万人,其中大多是从福建沿海、浙江及上海等地迁入。抗战中后期,宁波、绍兴、金华、兰溪、衢县、江山等地人口“大批涌入闽北”,南平人口激增,住屋与旅馆咸供不应求,公私医院门诊无不拥挤异常,其中以浙籍病家占大多数。又如崇安,抗战爆发后,浙江难民大量迁入,“一时间拖老携幼前去崇安垦荒者络绎不绝”,“移民地点遍及崇安南部每个村落和建阳县北部的许多地方”,仅1938年2月浙江省政府选送移往崇安等地就垦的难民及家属就有4000人。1941年后,迁入崇安的人口已扩展到其他行业,“移民不仅仅限于贫苦农民,其中还有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小业主等,各行各业俱有。”再如建瓯,汇聚的浙省人士也很多,“江浙一带的官绅、客商、学生、难民涌至建瓯,人们的生活用品日益紧张。”据笔者在衢属、处属等地的调查,浙省民众也有不少迁入闽北其他地方,如永安、邵武、建阳、建宁、顺昌、浦城、松溪、政和等地。

迁入江西的浙省人口主要分布于赣南地区。这可从国民政府制定的《难民输送计划大纲》中得到佐证。该《大纲》规定,“浙江沿浙赣铁路及铁路以东各地难民,由浙赣路送至南昌,再由南昌沿赣江经丰城送至赣南安置”,“浙南永嘉、青田、丽水、松阳以南各地难民经浙云和、龙泉、闽浦城、建阳、邵武、赣光泽、黎川、南城、临川、崇仁送至赣南安置”。可见,赣南是浙江难民的重要安置地。1939年2月南昌沦陷,江西的政治、文化中心转至赣南的赣州、泰和、吉安一带。当时任江西第四区专员的蒋经国主政赣州,实行一些开明政策,在赣州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等“新政”,影响及于整个东南地区。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也表现出进步色彩,邀请一些著名的进步教授、学者来赣从事救亡活动。在这一背景之下,浙省许多工商、文化人士及难民陆续迁入赣南地区。江西东部的玉山、上饶、鹰潭等地因紧邻浙省,也迁居了不少浙籍民众。

除闽、赣两省外,皖南地区也有不少浙省人口迁入。如屯溪,战初曾是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和第三救济区所在地,人口由战前的五六千增至20多万,其中就有许多迁自浙江。至1941年初,屯溪到处都是外地人,而“江浙人占了外乡人中的大半”。战时皖南的休宁、歙县等山区相对比较安定,与之相邻的浙省杭州、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桐庐、建德等市县的工商人士及难民也有一部分迁入此地。浙赣战役时期,原在战区经商的徽州人也纷纷迁回老家。

2. 上海租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英美等国持中立态度,上海租界成为局部的安全区。战区各地,尤其是江苏、浙江及上海华界地区的大批人口为逃避日伪的烧杀掳掠,保全生命财产,纷纷迁入租界居住。1938年至1941年4年间,租界人口净增78万。

租界增加的人口中,有不少迁自浙江,特别是杭嘉湖、宁绍等地的工商人士,如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民生药厂、孔凤春香粉店、王星记扇庄、张小泉近记剪号、翁险盛茶号、万隆盐鲞店、宓大昌烟店、边福成鞋店、亨得利钟表店等及宁波的正大火柴厂、太平面粉厂、恒丰布厂、源康布店等的业主、职工、店员等都有相当一部分迁入租界。其他社会成员也有迁入,如象山,“军兴以来,旅沪同乡为数日众,约计不下二万余人。”绍属各县,随战事推移,受严重威胁,“同乡青年负芟来沪者日众”。

3. 西南各省

抗战时期,浙省通往大后方的途径主要有二条,一是经长江溯水而上,二是沿浙赣线转其他铁路西迁。杭嘉湖地区沦陷之后,

后一线成为西迁的主途。因 1938 年 10 月前,武汉是后方抗战的中心,所以与其他南方各省一样,浙省人口先是涌向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武汉弃守后,难民又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其分布大势为:一是迁向重庆、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是战时陪都,成都、昆明、贵阳分别为四川、云南、贵州的省会,所以首先成为西迁人口的重要栖息地。如 1937 年,重庆有浙籍人口 3 150 人,1945 年增至 48 799 人。又如,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成都难民待遣人数统计表》(二一/1898)、《善后救济总署重庆难民疏散站成都办事处第一批遣送侨民及难民名册》(二一/1898)及贵阳、昆明的一些遣送、救济资料中都有大量的浙籍人口。二是迁入中等城市和交通沿线。除大城市外,中等城市和交通沿线也是西迁人口的重要分布区。因为这些地方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交通便利,住所和日常用品容易解决,择业也相对容易。如四川万县、邵武、沅陵、丰都、合川等地都有浙江人口迁入。贵州之遵义、湄潭因浙江大学的迁入也汇聚了一批浙江人士。广西桂林作为战时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同样吸引了不少浙籍文化人。其他如云南、湖南等地一些中等城市、交通沿线也有一些浙江人口迁入。此外,浙省还有部分人口迁入西北的陕西、甘肃等地。

(二)省内迁移人口的分布

抗战时期,浙省省内迁移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常常是一县的人口分布于省内各县,而另一县往往接纳十数或数十县迁移人口。但总的说来,其分布区域:一是迁向后方国统区;二是迁向沦陷区或游击区的安全地带。

抗战初期,浙北地区大部分市县相继沦陷,淞沪及杭嘉湖战区的难民及部分在此经营农工商业的外地人口,大批渡过钱塘江,进入浙东、浙南等后方国统区。当时迁移的路线主要有三条:“(1)由海盐、海宁、杭县、富阳等处渡江者,大部自临浦沿浙赣铁路转入内地;另有一部,经绍兴再向东南各县迁移。(2)由富阳、临安、于潜、昌化等县向西南迁移者,一溯桐江上徙,一由陆路南迁,转入金、衢、严各旧府属。(3)此外亦有由上海乘轮迳至宁波、温州转入内地者,但属少数。”王惟英根据调查资料,统计了迁至后方国统区的难民人数,至 1938 年 7 月共 1 310 801 人,其分布情形如下:绍属 273 407 人、宁属 199 450 人、金属 390 623 人、衢属 95 414 人、严属 80 549 人、台属 60 525 人、温属 180 375 人、处属 30 458 人。其中迁入金属地区的最多,再则是绍属、宁属和温属各县。迁入后方国统区的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如杭县难民,1938 年 8 月,“散居各县城者,诸暨约 300 人,义乌 400 人,东阳 300 人,金华 3 300 人,兰溪 400 余人,武义 270 人,永康 2 600 人,龙游 100 余人,江山 800 余人,汤溪 80 人,合计 1 万余人;散居各县乡村者,尚未统计在内”。杭嘉湖难民除迁向后方国统区外,其余大都避居沦陷区或游击区的安全地带,从县城避往乡村或从平原迁至山区。如,崇德县百姓,信奉“小乱避城,大乱居乡”的观念,“纷纷离开崇德(县城),往乡下投靠亲友。城内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又如邻近战区的富阳、新登一些山乡僻壤也迁来了大批难民。天目山一带的游击区域如安吉、孝丰、武康、长兴及昌化、于潜、临安等地的山区、乡镇迁居的难民则更多。

抗战中后期,省内迁移人口的分布也主要是上述两种类型。宁绍战役期间,战区各县难民大部分避入乡下,不少撤至四明山区和会稽山区。其余则陆续后移,杭嘉湖地区原迁宁绍各属的难民亦纷纷南下,迁入金、衢、台、温等属国民党控制区域。以汤溪县收容的难民为例,1941 年 1—5 月、7—9 月及 1942 年 1 月,9 个月的统计中,汤溪县共收容难民 1 292 人。其中绍属地区 868 人,杭嘉湖地区 426 人,这些难民基本上迁自宁绍战区。又如衢属之江山,自 1941 年 4 月日军进扰浙东以来,宁绍等地人口陆续迁至,“本县人口增加数在叁万以上,粮食供应倍增,万难为继”。龙游也于 1941 年度迁入人口 5 856 人。处属之龙泉还成立了绍属七县旅龙泉同乡会,可见其迁入的人数也不少。浙赣战役以后,国统区被压缩至金华—兰溪一线以南地区。战区民众纷纷逃至山区避难,如金华城厢居民,在接到金兰司令部的撤退命令后,“不得不抛弃家业,逃避乡间”。其中大部分避往安地山区。衢县居民则大都迁避石梁一带。同时,金衢各属民众也有大批迁至处属和温属地区,使龙泉、云和及温属部分县的人口激增。如龙泉县,据 1943 年该县政府调查报告,“本县自三十一年度起人口激增,外来机关、军队、公共户口约 3 万余人,城镇房屋之租赁遂成为大问题。”又如温属之永嘉 1943 年迁入 10 444 人。至 1945 年 6 月,避难国统区后方的人口仍有 651 055 人。

小结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得知,战时浙省人口迁移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它不仅包括消极的逃难者,也包括积极的抗战者,其迁移

总数达 500 余万,其中迁至省外的不少于 200 万,在全国迁移人口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迁移主要发生在战役前后,迁移人数随战局发展而波动,杭嘉湖沦陷时期、宁绍战役时期和浙赣战役时期,迁移数量较多,其他时期则变化比较平稳。

但无论省内迁移,还是迁向省外,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因全面的抗日战争前后共 8 年时间,浙江又是分阶段沦陷,所以人口迁移持续时间较短;日军占领的又大多是经济发达区域或重要城镇、据点,迁移人口的避难地除大后方、上海租界外,一般比迁出地要落后,生存环境要差。战时政府的安置与救济,主要是设所收容,进行生活救济,将其编入保甲,从事生产的只是少数。加之日军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实行了招致引诱的政策。所以,在抗战期间,浙省即有大量人口回迁。战后,政府机关、学校、金融机构、工厂企业及大部分人口陆续迁回。只有少数真正无家可归,或出于某种需要由政府部门强行留住的公营单位职员转化为当地的移民。这也说明,移民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

战时浙省迁移人口的流向和地域分布非常广泛,就迁向省外而言,其比较集中的分布区是闽、赣、皖,上海租界和西南各省。省内迁移比较分散。但总的说,其分布区域:一是迁向后方国统区,二是迁向陷区或游击区的安全地带。随着国统区的缩小和沦陷区的扩张,表现出向国统区逐次迁移的特征。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一些特殊的群体,如政界、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的迁移对推动抗战事业及迁入地工、农、金融、交通运输及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人口的大量迁移也必然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和社会问题,如加重后方国统区民众的负担,加剧疾病的流行,导致生态的破坏,引起土客冲突等。